

《宗教与世界》丛书

狱中书简

LETTERS AND PAPERS FROM PRISON

迪特里希·朋霍费尔 著
DIETRICH BONHOEFFER



四川人民出版社

狱中书简

迪特里希·朋霍费尔 著

高师宁 译

何光沪 校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2年·成都

(川) 新登字: 001号

Letters and Papers
from Prison
by Dietrich Bonhoeffer
Edited by Eberhard Bethge
Translated by Reginald H. Fuller

根据麦克米兰平装本1962年版译出

责任编辑: 汪 游
封面设计: 杨守年
陈万福
技术设计: 古 蓉

·《宗教与世界》丛书·

狱中书简

迪特里希·朋霍费尔著
高师宁 范艾 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成都盐道街3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mm₁/32 印张7.125 插页4 字数158千
1992年8月第1版 1992年月8第1次印刷
ISBN7-220-01776-0/B·32 印数: 1--3,000

定价: 4.50元

《宗教与世界》丛书

总 序

提起宗教，人们往往想起西天的佛、天上的神；然而，宗教就在我们周围的世界里。提起宗教，我们自然想起寺庙的烟、教堂的顶；然而，宗教就在人们的心中。

作为历时最为久远、分布最为普遍、影响最为深广的人类现象之一，宗教与人的世界紧密相联。人类文明的各个部门，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从哲学思想到文学艺术，从政治经济到文化教育，从道德伦理到惯例习俗，从科学理论到音乐美术，无论是社会的价值取向和共同素质，还是个人的心态结构和行为模式，都同宗教有着起初是浑然一体，尔后又相互渗透的关系。

马克思说：“宗教是这个世界的总的理论，是它的包罗万象的纲领。”“人就是人的世界”，要理解人，就要理解这个世界；要理解这个世界，就必须看其理论，挈其纲领。

当代宗教学家贝格尔说：“宗教是人建立神圣世界的活

动。”世界是人所理解的世界，要理解世界，就要理解人；要理解人，就必须考察其一切活动，其中包括人为自然立法、寻求或建立意义世界的活动。

现代宗教思想家蒂里希说：“宗教是人的终极关切。”人有种种关切和追求，但人不同于世间万物，因为人有精神性的、超乎自然和超越自我的关切和追求；人不但有对自我的意识，有探索人生意义的愿望，而且有对终极存在或宇宙本原（尽管对之有不同的理解）的意识，有探索它并同它和谐一致的愿望。要理解人与世界，就必须研究形形色色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其中包括这种精神性的终极关切，包括这种超越自我而与终极存在和谐一致的愿望。

这一切，都与宗教有关，都显示出宗教与世界的关系。

在构成世界上各种文明的物质生产、组织制度和思想观念三个层面中，宗教同第一个层面相互影响，同第二个层面相互影响又相互重迭，同第三个层面既相互影响相互重迭，而且在其中还往往居于深层和核心的地位。在了解世界上各个民族或国家，了解它们的文明或文化的时候，我们应该尽力兼及于它们与宗教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兼及于它们在各方面的历史发展和现实状况与其宗教的广泛深刻的关系；应该尽力从第一和第二层面深入于第三层面，深入于精神核心。编辑出版这套丛书，就是力求在对各族各国的社会文化和人类文明的认识中，增添角度，拓宽视野，由表及里，由浅入深，进而达到不仅识其形，而且知其神的境界！

对于宗教的人生观世界观内涵的研究，在我国应属一个“三径就荒，松菊犹存”的领域。我们应该尽力从全世界的思想资料中，了解全人类的各种看法；应该尽力从自己的生活实

践中，借助对这些思想资料的思考和批判而提出自己的看法，从而增进人类对自己、对世界的理解。编辑出版这套丛书，就是力求从这些思想的无尽长河中，掬起涓滴奉献国人，并且期望在不久的将来，国人可以将新鲜的活水，汇入其中。

何光沪

1988年1月于北京

中译本序

这本小书，早已成了一部世界名著，而在我国则还鲜为人知。

我国读者多半都熟悉《绞刑架下的报告》或《革命烈士诗抄》。这本小书也是一份“绞刑架下的报告”——作者被绞死时年仅39岁，这是他在受刑前单独监禁的两年中思想感受的真实记录；展现在读者眼前的，也算一份“烈士诗抄”——书中诗篇的作者虽非共产党员也不主张革命，而是一位牧师兼神学家，但他确实是为反抗为害人类的纳粹统治而牺牲的烈士。

也许可以说，“监狱文学”（这里指的，不是关于监狱生活的文学作品，而是在狱中写成的文章，即如尼赫鲁《印度的发现》亦属此类，尽管其文献性大于文学性）是文学中极其独特的一类。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最能表现人对于作为人之本质的自由的最深切的感受和渴求——对已经失掉的东西，比起对正在拥有的东西来，人往往有更深感受和渴求。我还想说，“死囚文学”（这里指的，是死囚自己的文字记录，而不是描写死囚的虚构作品，即如雨果的《死囚末日记》亦不在此

类，尽管它写得动人心魄）又是“监狱文学”中最为真实深刻的精品。因为它最能表现人对于生命本身、人的生存的最内在最深入最切身（即最主观）同时又最外在最游离最超然（即最客观）的感受和认识——对即将失去的东西，比起对正在安享的东西来，人常常会有更多的眷恋、更深的珍惜、更惨烈的失落之苦痛，也可能同时会有更远一步的审视、更准几分的评估，并且更加彻悟到自己不能也无权永远占有。何况在这里说的这个“东西”，乃是生命、自己的生命，乃是存在、自身的存在！海德格说：“只有面临虚无，才会想起存在。”曾子有言：“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文学的极致，一如哲学，不过在揭示人之本质与存在；对人的揭示，又不过主观和客观这两个角度。在监狱文学和死囚文学里，人在这两个角度上的自我揭示，不都最近乎极致，不都最接近真相了吗？

人生有一个真相，那就是，所有的人而不仅仅是死囚，其生命都是“即将失去的东西”。这个“即将”，当然有客观的长短之别，有主观的久暂之感，但所谓长短久暂，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差。人生还有一个真相，那就是，所有的人而不仅仅是囚徒，虽都“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卢梭语）。人对自由的理解以及由之而来的追求自由的方式，彼此相去之遥，何止万里！这两个涉及人的本质和存在的大问题，是哲学，更是神学的重要主题。这本书的作者作为神学家，不仅面对绞刑架，而且背负十字架，不仅身陷单人囚室，而且置身世俗世界，他对这些主题所作的超乎监狱围墙的思考，正是这本书的独特之处，也决定了这本书不同于其他的“监狱文学”或“死囚文学”，它不仅仅是“监狱文学”，也可以说是“监

狱哲学”或“监狱神学”。①

这位神学家参与的地下抵抗运动刺杀希特勒的计划没有成功，使他的希望破灭，否则那肯定会改变世界历史的进程；但这个年轻人在那非常的环境中写下的部分书信和记录思想的残篇断简在他死后由友人整理出版，却为他始料不及，竟然引起了神学思想的一次震动。这场震动，就是60年代后风行一时的所谓“世俗神学”或“激进神学”或“上帝之死神学”的出现。

提到“上帝之死”，我国读者近来对“上帝死了”这句话似颇眼熟。但是多数人只知道尼采或萨特或陀斯妥也夫斯基的作品中有这句话，却不知道把这句话扩展为一套理论或多套理论的那个神学思潮或流派，就是以这位早逝的青年作为鼻祖，以这本残缺的小书作为起点的。少数知道这一点的人则以为，这个学派既称“上帝死了”，必然是一些无神论者，是一些反宗教的革命派，而它的鼻祖，当然更是个彻底反宗教的无神论者了。

事实究竟如何呢？这个思潮或流派，确曾被一些人称为“无神的神学”或“非宗教的基督教”，因为它主张人类已经成熟，“上帝”已经死亡，基督徒应当彻底进入世俗社会，应当使基督教“非宗教化”。但是，如果仔细研究这个流派中不同神学家的思想，就会发现他们所说的“上帝已死”并不是说上帝不再存在（本来尼采那句话也只意指“人们已不信上帝了”），而具有复杂得多的彼此不同的含义（参见拙文《上帝死了，只剩道德吗？》，载《基督教文化评论》第二辑）。至于朋霍费

①本书德文初版题为《反抗与顺从——狱中书札》（Widerstand und Ergebung——Briefe und Aufzeichnungen aus der Haft），英译本初版题为《为上帝被囚》（Prisoner for God）。

尔自己，读者从这本小书可以清楚地看到，他虽然首次提出“世界已经成年”，不再需要“上帝”，但并不认为上帝不再存在；他虽然强调基督徒积极参与世俗生活，教会应该为社会服务，甚至激烈地批判宗教，但是他所反对的，实际上只是那些幼稚的或肤浅的或表面的或狂热的或虚伪的宗教现象和宗教行为。他一方面认为做基督徒就是要做一个真正的人，另一方面又为世界和人生而对上帝抱有深厚的感激之情和虔诚的信仰态度。当然，按照他自己或某些世俗神学家的说法，这种感情和态度不应称为“宗教”，而仅仅是“信仰”本身。然而，如果说宗教的本质就在于对神或上帝的信仰，那么我们就可以说，他还是有他的宗教的，只不过这种宗教（尽管按他和他的追随者以及巴特的说法，Christianity并不等于Christian religion）是一种成熟的或深刻的或内在的或谦和的或真诚的宗教而已。

实际上，朋霍费尔在本书中表现出来的思想相当复杂，甚至显得混乱和矛盾。这当然与他所处环境的极端严酷是分不开的。他关于“上帝软弱无力”之类说法，从社会历史方面来解释，可以归因于他对当时德国国内反纳粹力量极其弱小的深切感受。与抵抗运动悲剧式的反法西斯斗争烘托而成的这些思想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他那惊人的安宁、自制，对他人的体贴、关怀，以及那永不绝望的信念。这体现了他的思想的本质：参与上帝的存在，就要为他人而生活。这也表明了他所理解的基督教与人类生活的和谐，他所体验的神道与人道的一致。总之，他是一个真正的人道主义者，但又坚信上帝；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但不是宗教狂。

作为基督徒，他的信仰全部体现在效法基督为人类受难之

中。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明知回国凶多吉少的情况下，毅然选择了离开可以避难的美国而返回日益黑暗的德国，就是为了服务于他的同胞和人类。从全身心投入教会的各种工作，到积极地参加地下的抵抗运动，直至被捕被囚，终被杀害，他用全部生命实践了自己的这一信念：“假如我们通过此世的生活而参与了上帝的受难，成功怎么能使我们骄傲自大，失败又怎么能使我们迷失道路呢？”

关于朋霍费尔与世俗神学或“上帝之死”神学家的理论的是非和异同，是一个更为专门的学术问题，在此不遑详论。但是我们可以再说一句，朋霍费尔的著作，尤其是这本出自肺腑的小书，在他死后的世界上造成这么大的思想影响，倒是应了他临刑前的那句话：“这，就是终点；对我来说，是生命的开端。”

何 光 沪

1991年12月

这本书的翻译所根据的英文本，是Christine Nelson女士赠送的，值此中译本出版之际，我应该向她致谢。又及。

编者前言

迪特里希·朋霍费尔的父亲是一位杰出的医生，一名任教于柏林大学的精神病学家；他的祖先当中有好些市长和牧师。在符腾堡的施瓦比施-霍尔地方，教会中存有一些古老的墓碑，上面镌有朋霍费尔这个姓氏。他的母亲是卡尔·冯·哈塞的孙女。哈塞是耶拿大学十分著名的教会史教授，他也曾在—所城堡里尝过铁窗滋味，因为他当时热心于支持学生团体的自由。

作为一个大家族的成员（他于1906年2月4日生于布列斯劳），迪特里希·朋霍费尔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长大的。他曾在柏林的格林瓦德（绿色森林），同举世闻名的神学家阿道夫·冯·哈那克以及十分著名的历史学家汉斯·德布鲁克的孩子们一起玩耍。1924年夏天，他开始了在柏林大学的学业，1927年他以一篇关于圣餐的论文获得硕士学位。尽管哈那克、泽贝克和李茨曼等柏林大学最有影响的老师十分器重这位炉火纯青的青年神学家，他还是越来越多地接受了他从未听过其讲课的卡尔·巴特的影响。^①这种影响清楚地表现在他后来的大

^①巴特的理论与哈那克等的自由派神学相对立，故有此说。——译者

学论文 *Akt and Sein* (《行动与存在》) 之中, 在这篇论文里, 他明确指出了辩证神学^①对于哲学史和神学史的重要意义。

他在巴塞罗那做过短时期的牧师 (1928—1929年), 又在纽约协和神学院学习过一年 (1930年), 然后开始任教于柏林大学。除了一些短暂的中断, 他一直在柏林大学教书, 直到1936年国社党当局最终禁止他授课为止。在这些年间, 最重要的一次中断出现在1933—1935年, 那段时期他承担了圣保罗和伦敦西顿汉地区德国会众的工作。他采取这一步骤的缘由, 是要对德国教会中初露端倪的所谓“日耳曼基督徒”倾向^②提出明确的抗议。从这个时候起, 他便成了为西方的普世教会解释德国发生的事件的最重要人物之一。

正当他与 C. F. 安德鲁斯进行接触, 准备去拜访甘地的时候, 他收到德国宣信教会^③的一项请求, 要他回国去领导一所在波麦拉尼亚设立的培养青年教士的临时神学院。在履行这项职务期间, 朋霍费尔的神学影响和人格影响达到了顶峰。在这所神学院, 他写了许多小册子, 反对在教会斗争中进行妥协。在这里, 他还写了《信徒的代价》(1937年) 以及《共同的生活》(1938年), 这两部著作在他生前曾使他的名字和思想广为人知。

正当他在《信徒的代价》中对“廉价恩典”所作的激烈攻击引起的讨论还在进行之际, 种种完全不同的事态发展开始改变了他的生活和思想的整个方向。通过他的姐夫汉斯·冯·多

①巴特的“上帝之道神学”又称“辩证神学”。——译者

②这是指当时德国教会中拥护纳粹政权的部分教徒的民族主义或种族主义倾向。——译者

③这是当时德国部分教会人士(包括著名神学家巴特)为与拥护纳粹的教会对抗而成立的一个教会。——译者

纳尼，他得以略微窥知了围绕冯·弗里奇将军出现的危机，以及与贝克将军有关的推翻纳粹政府的计划。在此之前，由于受到在英美的经历的影响，朋霍费尔一直非常接近于绝对和平主义——一种那时在德国还鲜为人知的立场。可是现在他开始发现，和平主义是一种不合理的逃避，尤其是假如他由此受到诱惑，从而脱离同抵抗运动的那些有责任心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日益增加的接触的话，就更是如此。他再也看不到有任何出路，可借以躲进某种忠顺的境界。1939年，他在美国作讲学旅行时，他的美国朋友们从各方面极力劝他留在美国，在那里搞一些适合于他的普世主义思想、适合于他对外国教会生活的善意关切的工作，但他却决定返回德国，回到那显然正日益恶化的环境中去。他搭上的船，是战争爆发前夕返回德国的最后几艘之一。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不明白我为什么呆在此地。……我们念及自己的德国弟兄的那次简短的祈祷，几乎使我不能自持。……如果说事态正变得更不肯定，我则是肯定要返回德国。……在战争情况下，我不要留在美国……”最后他写道：“自从上船以后，我内心里就前途问题进行的斗争就消失了。”

10

于是，他开始了这样一种生活，即忙于宣信教会的各种任务、各处视察，忙于他的《伦理学》一书的繁重工作（这部书没有完成，最后于1949年在他死后出版）；此外还有抵抗运动的种种任务，包括所需的多次旅行，在所有这些工作中，最艰难而又令人感动的，是1942年访问斯德哥尔摩，以便同奇切斯特主教进行会谈。一方面，他要在盖世太保设置的种种障碍——禁止他授课、写作、发表任何演说，禁止他呆在柏林——之下，做好自己的教会工作；另一方面，他又求人悄悄地给他提供各种各样的护照以及一位特殊信使所需的种种文件。于是，他在

内心里树立起了一种非同寻常的信心。然而好景不长，1943年4月，一个晴朗的星期一，我们听说汉斯·冯·多纳尼在他的办公室里被捕了，然后我们听到摩托车停在朋霍费尔的前。我们尽量按照对这次预期中的来访的准备收拾好房间：把文件收藏妥当，把另一些可以提供虚假情报和不重要情报的文件放到桌上，果然，朋霍费尔被捕了。

迪特里希·朋霍费尔被监禁的头18个月，是在柏林的特格
11 尔监狱军事部度过的。那是从1943年4月5日到1944年10月8日。在经过许多次的推诿之后，他终于得到许可给父母写信。这本书的第一部分就是从他给父母的书信中选出来的。这些信都必须经过监狱的审查，特别是要由负责司法检察的罗伊德博士读过。这种环境自然影响了书信的内容。然而更加明显的是，朋霍费尔特别关切要减轻他的家人的焦虑。

但是，在6个月之内，朋霍费尔已在看守和护士当中交了一些很好的朋友，以致他可以开始扩大自己的通信范围了，有时是用书信，有时则用一些纸片断筒。通信的对象包括许多朋友，其中也有编者本人。为了安全的缘故，当时不能不遵守某些规则。所以，关于某些处于危险地位的人，关于抵抗运动的进展，关于对他的案子的调查等方面的情况交流，都只得使用暗号进行。不过通信还是一直进行着，未被阻断，直到7月20日^①以后采取紧急措施，以及1944年9月卓森文件（与同卡纳利斯、奥斯特、汉斯·冯·多纳尼等人有联系的抵抗运动成员有关材料、日记和别的一些可据以控告的证据）被发现为止。结果，朋霍费尔被盖世太保转移到阿尔伯特亲王街，进行严密

* ①未成功的谋刺希特勒的日子。——英译者

12
监禁。十分不幸的是，这次转移以及编者本人在1944年10月的被捕，使得他在特格尔的最后几个月写的书信为了安全的缘故而不得不销毁了。较早时候写的所有书信，当时已经保存在一个安全的休养地。这些信组成了这本书的第二部分。在这些信里，朋霍费尔随便地谈到了他的体验、思想和情感，尚未受到陌生人监视着的眼睛的干挠。

在他给我的信里，他附寄了一些他写的作品，其中有祈祷词、诗歌和沉思录。

这些书信使我们能够重现一副单人囚室里的生活的图景，过着这种生活的，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敏感的人。在这里，我们能够看到一种个人生活的隐秘细节，这种生活已惊人地融汇入正在外面世界上发生的悲惨事件之中，与之融成一体，一个由多思的头脑和敏感的心灵造成的统一体。这整个的图景，在1944年7月21日的短信和“通往自由之路上的各站”中得到了一种凄凉的总结，这篇东西写于7·20密谋失败的消息之后，那时候，朋霍费尔开始相信自己的日子已经不多了。密谋的失败对朋霍费尔是一个可怕的打击，但是他在面对这一打击时，心里怀着为自己的人民服务的更新了的献身精神，怀着承担一切后果和附加的痛苦的坚定决心。将来，人们会更清楚地认识到，这第二个献身行动如何为第一个行动作了辩护，并证明了它是一笔不朽的遗产。人们可能不曾利用这笔遗产，但决不会丧失这笔遗产。

13
在阿尔伯特亲王街，与外界接触的机会被大大减少了。信息或生活必需品的接收和发送，完全由那些政委任意决定。有一天，迪特里希的家人发现他突然失踪了。盖世太保绝对拒绝提供任何关于他的下落的信息。那是在二月间。直到1945年夏天，

即在德国崩溃一段时间之后，我们才知道了他的遭遇。他先是被转移到布痕瓦尔德，然后又转移到索恩贝格，最后被送到了弗洛森布格。现在，他在最后时日的处境已渐渐清楚了。在狱中书信之前有一篇题为“十年之后”的文章。这篇文章写于1942—1943年之交，并被送给几位朋友作为圣诞礼物。那时候他已得到一些警告，主要是汉斯·冯·多纳尼的警告，说帝国中央安全局正在搜集对朋霍费尔不利的证据，有意要逮捕他。这零篇断简式的文章被藏在屋顶的梁椽之间，在那里躲过了警察的搜查和敌军的炸弹。它是那时候我们据以生活并（如果需要的话）承受苦难的那种精神的见证。

朋霍费尔的最后一个星期，是与来自欧洲各地的囚徒一起度过的。这些囚徒中有一位英国军官，名叫佩恩·白斯特。白斯特在《文洛事变》一书中写道：“朋霍费尔……简直是谦卑虚心与亲切温和的化身，在我看来，他在生活中每一件小事上总是在散布着一种幸福和快乐的气氛，仅仅为他活着这个事实也总在散布着深切感激的气氛。……他是我所见过的极少数这样的人之一，对他来说，上帝是实实在在的，是近在身边的。”^①下边又写道：“第二天，星期天，1945年4月8日，朋霍费尔牧师举行了一个小小的礼拜仪式，他对我们讲话时的那种神情，深深打动了我们所有人的心。他找到了最恰当的词汇，表达了我们在囚禁中的精神，及其所带来的想法和决心。他刚刚做完最后的祈祷，门就开了，两个面带凶相身着便服的人走进来说：‘囚犯朋霍费尔，准备跟我们走！’‘跟我们走’这几个字，对于所有的囚徒来说已经只意味着一件事情了——绞刑架。

^①该书第180页。